



投稿邮箱: xzhtwxds@163.com

扫码关注“徐州放鹤亭”微信公众号

乡愁记

一抹乡愁最难忘。四季风物、市井习俗,抑或是那些平常又平淡的舌尖记忆,故乡总会以其独有的方式刻进你的脑海,让人念念不忘,并终究会成为心底里最柔软的地方——

在老街的怀抱里

梅叔

子下摆,一步一步向学校走去;而低年级的同学,则聚在学校对面高处,发愁怎么过去。

远远看见对面来了一位个子不高的阿姨,抱着个西瓜,慢慢摸索着往那挪,到了学校门口,她一脚没有踩实,身子一歪,西瓜掉了。圆溜溜的大西瓜,调皮地在水面上晃来晃去,就是不沉。她愣了一下,接着就干脆用手扒拉着西瓜往前走,来到水浅的地方,才弯腰抱起西瓜,扬长而去,留下目瞪口呆的我们。后来听老人们说,熟透的西瓜因内有氧气,才不会沉入水下。

燕子楼小学西墙外,现在是西安南路,以前叫老驴市街,是老城西门外农民进城歇脚的地方。解放后,老驴市街就并入了博爱街。

博爱街原名西关大街,是徐州老城西门外最繁华的商业街,青石板铺就的街道两旁,店铺一家挨一家,吃喝玩乐无所不有。

博爱街的酱园、五分钱(不到五分钱的)早点、钱记的酒坊、拉风箱的崔家茶馆、幸福豆腐店的豆腐,那都是有名的。

听叔伯哥哥讲,解放前我爷爷在博爱街开过一家卖酒的铺子,那酒香一条街都能闻到。而在我的记忆中,博爱街果品商店的“八五”散酒,才是名扬徐州。记得我大爷抿一口“八五”散酒,再来两粒花生米,瞬间就眉开眼笑了,愉悦又舒适。

博爱街上名气最大的店面还得数新华池——洗澡,那可是老百姓生活中的大事情。我小的时候,家里是没有暖气、空调的,公共澡堂也很少,夏天在家用大盆洗澡;春秋,大盆上面用塑料浴罩罩着洗;冬天洗澡,竟是件费时、费力的事儿。

新华池外间是换衣服的大房间,一排一排的小床,煞是壮观。没有更衣柜,小床上摆满了衣服,互相穿错衣服,是免不了的事。里面则隔成一个个小隔间,每个隔间内都有两个盆池,供客人使用。

那时经常是大娘带我去洗澡。一到星期天,吃罢早饭,大娘就喊我去排队。我一溜小跑到澡堂售票亭,递上8分钱,换来一个脏兮兮的蓝色竹签,又连忙拿着竹签去换衣服的地方排队。

有时候起晚了,要排到中午十一点才能轮到我们洗澡,肚子饿得咕咕作响,想动作快点,可脚上穿着呱嗒作响的厚底“呱嗒板”,怎么也快不了。

遇到下雪,我们经常顶着一头冰碴回家,更可笑的是男人们,他们个个头发直立,一副怒发冲冠的样子……

就这样,杨家路、博爱街,我在老街的怀抱里长大,成年后的我,却远离了这里。

回不去的岁月,最难忘,忘不掉,那就写出来吧。我不能确定自己的文字,是否能引起同龄人的共鸣,但对于我来说,这些总是“不吐不快”的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我家住在杨家路万里巷15号。大门前有个石臼,小的时候,好像也没见谁用过它。但我家的水桶、扁担可都没闲着,我们是个大家庭,叔伯聚居,人口多,洗衣做饭、洗洗刷刷哪一样不需要水?

杨家路西头有一个公共自来水站,就是自来水公司在一定范围内建一个公共自来水管,由专门的人经营卖水。1分钱能买到10张硬纸壳子做的水牌,上面印着经营者的私章,一个水牌可以接一挑子水。

挑水是大人的任务,小孩也不能闲着,我就曾被大人派出去,拎个水桶先去水站排队。因为个子矮,虽然只是一个空桶,我拎着也很有些吃力,一路摇摇晃晃,好似醉汉,一不小心,被水桶碰青脚蹠,也是常有的事情。等到了水站,水桶林立、小孩成群,大家一边嬉戏,一边还不忘用脚,及时把自家的水桶往前驱驱。

大概在我七八岁时,就不再拿水牌去水站买水了。我们家往西100米、永安街小学南墙外,建了公用的自来水管。

“站”和“管”是有很大区别的,“管”没有中间的经营者,住户分摊水费。水管下可热闹了,有挑水的,有淘菜的,有用大盆洗衣服的。搓衣板上,泡沫闪着七彩的光,嘻嘻哈哈的笑声、咋咋呼呼的聊天声,能传出半里地去。因为水费便宜得多,用水也就不那么抠抠搜搜了,自来水哗哗地流出来,给大家聊天嬉闹添上了欢快的伴奏。

上世纪八十年代初,自来水干脆通到了家家户户,这回水桶、扁担和门前的石臼一样——也成个摆设。

水桶、扁担闲下来,我可没闲着,要上学了。博爱街原有个地藏王庙(后被拆除,原址重建,改名“广化寺”),当时,庙堂被用作燕子楼小学的教室,我在那儿读了两年的书。我的哥哥姐姐是在龙王庙(现电视塔附近)上的课,阴天下雨光线暗时,还享受过烛光下的课堂。

一直到小学三年级,我才搬到位于博爱街和道平路(现建国西路)交叉处的燕子楼小学上课。

记得燕子楼小学里有两个水泥暗堡,暗堡的东面也就两米高,有机枪扫射孔,西面是个斜坡。我们天天在上面爬来爬去,当滑梯玩,时间久了,那水泥面居然被磨得锃亮。

前几日到燕子楼小学寻旧,听保安师傅讲,燕子楼小学20年前就已经改成泉山区教育局了。地堡的位置在办公楼前,它突出地面的部分被拆除时,因时代久远,地下满是积水,有好奇者拿竹竿试探到底有多深,结果四五米长的竹竿居然没有探到底,不知费了多少碎石才填满。

关于燕子楼小学,让我印象深刻的不光是暗堡,还有大雨过后学校门前的马路。东西方向的道平路地势低洼,校门口更是重灾区,学校倒是坐落在高岗上,不怕风吹雨打。

上五年级那年6月的一天,大雨噼里啪啦地下一夜,第二天早上,我刚走到学校西边,就看见几个高年级同学,小心翼翼地蹬着水,男同学两只手提着短裤的裤脚,女同学拎着裙

多年后,大街小巷兴起菜煎饼,一份就是十多块钱,菜煎饼里的蔬菜多达十余种,却再也做不出“妈妈的味道”、做不出“故乡的味道”。

盐豆、黑咸菜、辣疙瘩、萝卜干、咸鱼头……20年后,那些漂泊在外的游子,为买到一份“湿盐豆”、几张“手工煎饼”,竟可以认真地翻越一座城,甚至央求老乡们“寄点来”。相逢话乡情时,聊得最多的也是家乡的“美食”,讲到大豆脑和油条搭配时,闻者均口津连连。

一生四海为家的大诗人李白,在无数次的回望中浅唱低吟——“举头望明月,低头思故乡”。月是故乡明。月亮走,我也走。前些年,窑湾船菜进军徐州城,再之后是睢宁菜声鸣鹤起,都是老家的味道。儿时的味道、“妈妈的味道”啊。可惜,在中华遍地“融合菜”的传感下,我们从这桌到那桌推杯换盏,又能吃到多少本真的故乡味道?

三

故乡,是游子心中最柔软的地方,这既是时间上也是空间上的。在时间上,随着年龄的增长,寻根意识愈发强烈,“落叶归根”是几千年的游子梦。在空间上,异乡的风物、人情、巷陌与故乡的山山水水毫无关联,成年人的压力阀升压时,故乡便成了游子最后的港湾。

对于故乡的认知——尽管人生前20年都是在那里度过,尽管空间的拉近已缩短至短短的半小时高铁车程——但至今,仍接近一片空白。

20岁之前,我的天空仅限于贫瘠的农村,“城市”新沂于我十分遥远。直到离开故乡的前一年,我在新沂郊区一所私立高三复读备考时,才得以管窥一二。那天,我骑着叮当作响的自行车,绕着新沂市中心的白龙马转盘盘绕了一圈又一圈,那是这座城市最具代表性的地标。在高铁站未建成前,一茬又一茬的新沂游子,从“白龙马”下打马而过,与故乡作别……

2016年仲秋,一则《徐州市民将喝上源自骆马湖的优质水!》的新闻在“新沂人在徐州”的聊天群里引起关注,离开家乡多年,从此还能再饮家乡水,这哪里是水,这是故乡母亲甘甜的乳汁啊!那一刻,我们远远地流下了幸福的泪水。外乡人不解,几多调侃:为何是“骆马湖”,而非“落马湖”?《淮安府志》记载:“骆马,旧作落马,受沂蒙诸之水汇为巨浸(湖泊)。”

细心的读者也许会问,新沂之湖为何要载入《淮安府志》?实际上,在“丰沛萧萧,铜狄难留”的徐州老八县里,新沂是无一席之地。直至1953年才由淮阴专区划入徐州专区,新沂才真正编进徐州的怀抱。

对于故乡新沂,我只能在离开后一次次去回望,去认识。甚至是马陵山、骆马湖等家乡名胜,也是因为工作关系去采风时才得一睹芳容。当一群同事得知我是新沂人时,纷纷让我当导游。围于一村20年,又从何谈起?甚至与我的乡镇一湖之隔的窑湾古镇,我至今仍没有机会涉足。从这个角度讲,我对故乡的解读是完全不及格的。当然,那一天,当我们踏进马陵山,当“第一江山”四个大字扑面而来时,家乡新沂,狠狠地替我抓了一把面子!

这些年,虽然在徐州,但故乡的消息却越过白沙河常及耳畔。距离九子庄西南2.8公里建了新沂通用机场。九子庄东2.5公里外的山梁上,宋庄民宿和农民丰收节活动蜚声国内。九子庄正东,跨过那道山梁又2公里,是赫赫有名的花厅遗址——那是重要的史前文化遗址,是北方大汶口文化与南方良渚文化的交汇融合。父亲从前常喝的花厅白酒,也是因花厅遗址文化而得名。而村头那条日夜沉积白沙的白沙沟,那让“黄沙”黯然失色的“白沙”竟然是石英砂。

后来,我在教科书上读到“石英、长石、云母、方解石是组成岩石的四大岩矿物”时,才发现故乡的宝藏气息竟如此浓烈。这一切,随着前些年石英砂矿的开张、关停,俱已画上句号。空荡荡的山梁上,如今只留下四处较大的水泊,而那条日夜流淌的白沙沟也再不见有绵绵白沙流过。

再回故乡时,九子庄只剩下杂草丛生。偶尔,在干涸的白沙沟旁遇到三两旧庄邻,鬓已苍,朱颜改,相逢错过身,竟不记得曾经。

故乡仍在那里,故乡却已把我忘却,我亦不再属于故乡。果真是:少年不知乡愁意,再归已是愁乡人。

(作者系徐州市作协副秘书长、徐州市青联副秘书长)

20年前的仲秋,我背起行囊,跟在父亲身后,从村东头三间低矮的茅草屋走出——走出那个叫九子庄的新沂小村落。那天,一场异乎寻常的滂沱秋雨将村口的大桥冲垮,我和父亲将鞋袜脱掉,挽起裤管,蹚过那条凉意十足、日夜流溢白沙的白沙沟,蹚过我年少的贫瘠和轻狂,以“风萧萧兮易水寒,壮士一去兮不复还”的决绝离开生我养我的九子庄。

潦草的告别,就是漫长的一生。数年后,我完成学业,毅然蜗居于三百里外的徐州城。再数年,九子庄在城镇化的进程中一夜之间消失。从此,我再也不属于那个村庄,那个村庄在中国地图上亦不复存在。我只能无数次在梦里泪眼回望九子庄和白沙沟……

九子庄前白沙沟

孙梦

二

甫入大学时,对于20年来从未走出过故乡的“土包子”而言,夺舍眼球的不是高楼大厦和车水马龙,而是象牙塔内遍地的播音腔。在“土话”几番遭到取笑后,我不得不生硬地撇着声调去讲话。我庆幸新沂大地的“北方方言”是那么接近普通话,这让我很快度过了“难推的、僵硬的饶舌期”,以一口“徐州乡下普通话”融入校园。就像一群潇洒自如的白鹅,后面跟着一只摇摇摆摆的鸭子。

尔后多年,便是与徐州土著们长相厮守。终于长出一口气;再也不用绕着舌头说话了!

很快,我就陷入了新的尴尬:新沂话,与徐州话,画不上等号。不得不承认故乡新沂母语的强大影响力,虽然我已成功甩掉“带”“喊”的尾音,但那口啾啾的乡音仍若隐若现,无论在哪个场合,只要我一张嘴,仍会让对方迅速作出判断:你是“东三县”人!然而,每逢春节回乡,亲朋又或多或少流露出讥讽之态:才离家几年就忘本了?你看,连新沂话都不会说了!

是的,虽然不纯正,但徐州新的语言环境正潜移默化成为我的“目标语言”。《孟子·楚人学齐语》中讲到:“引而置之庄岳之间数年,虽日越而求其楚,亦不可得矣。”可见,新的生活环境足以改变人的语言、习惯乃至习俗。家妹定居沛县后,也被“目标语言”影响,“吃饭”说成“刺饭”。大学时,曾修习一门《方言学》,我深知“出门三五里,乡音尽不同”,但从未想过,明明是喝一口老井水长到的一家人,坐在一张桌子吃饭,也能出现各种“方言”的奇怪现象。

当年,我因为不会讲普通话而一度怯懦自卑;如今,我却为不会说“新乡徐州话”和“旧乡新沂话”而感到愧疚和失落。人生如浮萍,不得不自嘲:“徐州,融入不了;新沂,亦回不去。我被方言的列车抛到了二半路,恰居住在徐州和新沂之间的徐州经开区,从此就是‘郊区方言’。”

而我的孩子恐怕连郊区方言也不会说了。因为他从一出生就是讲普通话。有时我在想,方言会不会从他们这一代开始消失。他们尽管不会再有普通话的困惑,却也从此失去浓稠的乡音味儿,而他们的后人在规范的普通话康庄大道上更将一路高歌,我们栖身寄命的方言有一天恐将只存在于那本薄薄的《方言学》教科书里了。

其实,诸般人生况味中,非常重要的一项就是“他乡融入”与“故乡意识”的反复拉扯。我们在异乡的茫茫人海中,耳畔忽然传来一声亲切的乡音,整个人包括目光、心脏、血脉都被生生地吸引过去。可是,当我靠上前去,却再也讲不出那口能让自已热泪盈眶的故乡新沂话了。用余秋雨的话说,“故乡,就这样被我丢失了。故乡,就这样把我丢失了”。

他乡且变故乡,故乡已成他乡。